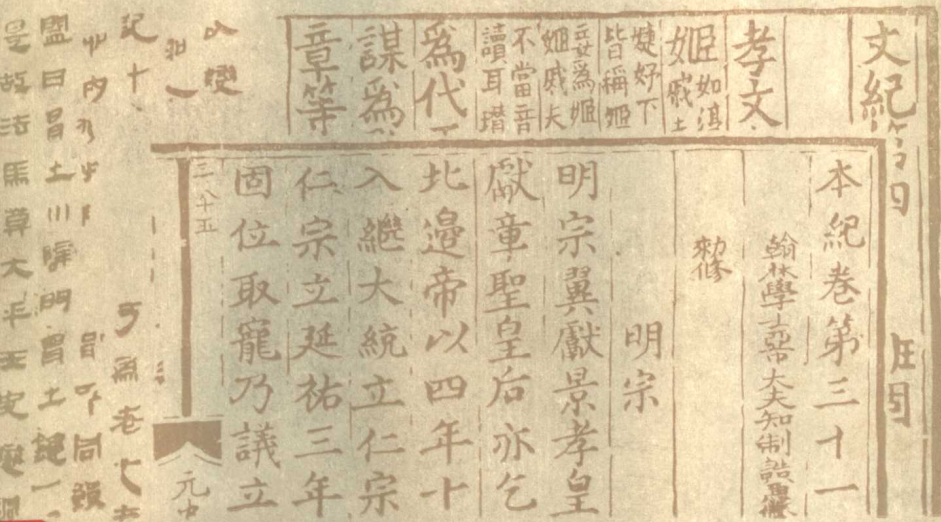


文物考古知识

中国古代书籍史

李致忠 著



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代书籍史

李致忠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阚文青

中国古代书籍史

李致忠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开 印张：6.5

1985年12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11068·1362 定价：1.00元

目 录

一	绪论	(1)
二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11)
	(一) 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11)	
	(二) 我国初期书籍的产生 (20)	
	(三) 正规书籍的产生 (32)	
三	书籍的生产	(44)
	(一) 书籍的生产材料 (44)	
	(二) 书籍的制作方法 (55)	
	(三) 历代书籍的生产概况 (78)	
四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118)
	(一) 中国古代书籍的版面装饰 (118)	
	(二) 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125)	
	(三)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的演变 (148)	
五	中国古代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管理	(175)
	后记	(195)

一 绪 论

这本小书，叫作《中国古代书籍史》，或者叫作《中国古代图书史》。

为什么不取已有的名称，继续沿用《中国书史》的题名呢？是不是有点想标新立异，做文字概念的文章？我的回答：不是这样。

名《中国书史》，并没有意义上的错误，却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书”字，在古代固然有概括载籍的涵义，例如《史记·礼书》，司马贞在给“书”字作注时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就是明证。但在古人通常的概念里，对书很少直称为书，一般多称为载籍、经籍。直称为书者，通常则指书法、书写、书体，有时则专作《尚书》的简称。例如宋代的大书法家米芾，就著有《书史》一书。米芾又号米海岳，故此书又称为《米海岳书史》。此书是作者考定书法名迹，叙述流传渊源，品评摹拓情况，审别装裱优劣的专著。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名迹和书法艺术发展史较早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古书中这

类例子还多，不再枚举。为了避免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不如捨《中国书史》之名，直称《中国古代书籍史》或《中国古代图书史》，也许来得更明确些。

此外，流行的几种讲中国书籍史的专著，例如陈彬龢、查猛济生生的《中国书史》、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的故事》、庄蕤同志的《中国书的历史》、美国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等，都从古讲到今，对现代书籍亦多寡不同地有所涉猎，故敢于名为《中国书史》。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容，想暂把现代部分略去，故只好称为《中国古代书籍史》。这也是未沿用《中国书史》之名的原因之一。

讲中国书籍的历史，与讲中国历代通史、史学史、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小说史、目录学史等学科史，不尽相同。讲学科史，在于透过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勾画出某一种科学在各个相应时期发生、发展以及衰亡的历史原因；揭示出学科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管怎么讲，讲学科史，涉及的还多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多指人们的精神产品方面。书籍史则不同。书籍史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牵涉的问题也极为复杂，这是由于书籍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所决定的。

书籍作为一种社会产品，自身就具有两重性。一是任何一部书，不管它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只要它一被社会生产出来，就既是社会人们的物质产品，同时也是社会人们的精神产品。工人做

工，农民种田，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这些产品本身则仅是物质而已，并不包含思想意识在里边。书籍则不然。从它的物质形态讲，它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从它的意识形态讲，它又是社会人们的精神产品。因此，书籍是一种具有思想内容的特殊产品。这样，就决定了书籍史的任务必须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下手，不但应该讲到它物质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还应该讲到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政治倾向、经济状况、文化风尚等对社会人们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通过人们的思想折射，又反映到书籍内的规律。如此说来，讲明这门书籍的历史，绝非轻而易举。

从书籍生产的自然程序上讲，应该是先成精神产品，后成物质产品。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著作，才有书籍可言。而著作就是精神产品。

精神是人类所特有的。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分是什么意思？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群是以氏族部落相分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群就以阶级、阶层相分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人首先是按阶级划分的。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各种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带上阶级色彩。而

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意识，反映在各种著作中，也就使书籍蒙上了阶级色彩。这也是书籍同其它社会产品不同的地方。

阶级特色之外，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色。殷周时期的奴隶制时代和以后的封建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各个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尽相同，又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书籍作为精神产品，无论其在产品数量和产品倾向上，也就带有不同的时代特色。

当然，同是一个阶级，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平生际遇的不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作家、学者，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表现在书籍中，也就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思想高度。

即使在同一个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某种政治和文化风尚，或由于某些身居显位、炙手可热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们的提倡，也会形成某种风靡一时的文化倾向或学术倾向。而当这种倾向成为束缚人们手脚、阻挡事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障碍时，总会有人举起文化的义旗，号召人们去向它进行猛烈的冲击。例如明朝，前期一百余年间，整个文坛被藩王和几朝阁老所垄断，文章空泛，诗崇台阁。李东阳在朝几十年，未出过城禁。写诗为文，除了空泛的词藻和歌功颂德，毫无实际内容。但因他是几朝阁

老，地位显赫，一些追求功名科第的庸俗士子，却要投门拜师，追随骥尾，于是造成了风气。但到正德、嘉靖时，以何大复、李梦阳为首，打起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大旗。经过前后七子的不懈斗争，终于打破了那种凝固僵化的局面，开始了新的方向。后来尽管又有公安派、镜陵派起而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毕竟也不同意于台阁体的桎梏。加之后来李卓吾等人的离经叛道，学术空气毕竟有了很大的转变。所有这些，反映在书籍的生产上，也有前后明显不同的倾向。

因此，讲书籍史，首先就应该揭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不同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倾向和不同的文化风尚下面，创作书籍的不同历史背景。从而使书籍史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内容和历史分析上，不单纯地讲它外部形式。

书籍除了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物质产品，也具备物质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籍史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十分复杂的。

谈到书籍的物质生产，至少要把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装帧技术，以及由于制作材料或制作方法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装帧形制的演变等等，讲出个大体的轮廓，找出它们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和内外原因。

书籍的制作材料，不是一开始就象今天这样全是纸质的书，而是经过用兽骨、用金属、用石头、用竹木、用缣帛，外国还有用树叶、用羊皮的，最后才走上共同用纸的道路。既然书籍的制作材料有前后这么大的变化，其制作方

法和装帧形制也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牵制。例如：用兽骨、石头、金属、竹木乃至缣帛做书籍制作材料，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会采用印刷的制作方法，只能采用笔写或刀刻的制作方法。而且在使用这些当作书籍制作材料的历史时期内，印刷的方法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在社会实践上还未对它提出强烈的要求。相反，在印刷的纸质书大量盛行以后，那种笔写刀刻的方式也就基本被淘汰了。

可见，书籍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日益需求，其制作材料也日益更新。而随着书籍制作材料的不断变化，其制作方法也日渐发展。

从甲骨、石头、金属器皿时期的刀刻或铸造方式，到竹木出现以后就一变而为书写了。待到手写纸书盛行一个时期以后，社会更发展了，需要更加大了，于是雕板印刷术出现了。雕板印刷术较手写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毕竟还得一种书刻一套板，一套板只能印一种书。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要想生新，就只好再刻一套板。针对雕板印刷术这种局限性，于是活字印刷术又出现了。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保守，活字印刷术在我国出现虽早，且采用过多种材料的活字试验，但终未推广开来。然而，它毕竟是新生事物，它代表了书籍生产的新方向，因而，虽被长期冷落和压抑，最后还是胜利了。清代雍正时期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表明在清朝前期，活字印刷的技术已被政府承认并应用。此后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中国印刷技术又走上了世界共同的道路。

这种书籍制作方法的不断改进，不但影响书籍制作材料的改变和改进，如印刷术的出现不但必须要求用纸，而且还要求造纸工艺不断改进。更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影响了书籍装帧形制和方法的逐渐演变。

书籍的装帧似应包括版面设计、插图方式和装订形制。书籍的装订形式与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有直接关系。竹木的书只能是编联之后卷起来。缣帛的书就比竹木书更灵活，但也还是以卷起为宜。待纸书出现以后，特别是当印刷的纸书出现以后，就不但可卷、可折，也可订了。

至于书籍的插图，是中国书籍自古就有的。现代人的概念，插图亦属书籍装帧艺术的内容。其插图形式、位置以及多寡，也跟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和装订形制相关联。竹木的书籍，只能用方版绘图，尚难谈到什么装帧艺术。帛书，特别是纸书盛行以后，由于较长时期采用卷轴装式，其插图也只能较多地采取卷首扉画的形式。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雕印普施的《金刚经》

（今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就在卷首镌图。北宋开宝年间在成都雕印的大藏经，称为《开宝藏》或《蜀藏》；金朝大定年间北方山西崔法珍断臂募刻的《赵城金藏》，也都是卷首镌图。这些当然是由卷轴装式所决定的。宋朝经卷出现过连续插图的形式，这已经意味着改进和革新了。

当印本书籍出现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以后，由于装式由卷轴变成了方册，插图也就逐渐由单一的卷首扉画形式变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了。有的先图后文，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一图一文；有的

连续。有的集中，图文并茂，绚丽喜人。

所有上述这些属于书籍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内容，讲书籍的历史也应该多寡不同。深浅不同地有所涉及。并通过简明的叙述，揭示出它们彼此的关联和演变规律。

当然，前边所谈的还都属于书籍本身的内容，其属于与书籍生产有关的内容，例如历代关于书籍生产和流通的管理。讲书籍的历史似也应该有所涉及。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和文化崇尚，对书籍生产和流通都曾有过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管理政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是为齐一思想，对书籍流通的一种管理政策。汉代刊刻熹平石经立于东都洛阳的学宫，是为了树立儒家经典的范本，以便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从而统一人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这也是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一种管理。唐朝已出现印本书，包括历书，民间雕版印刷也广为流行。于是由皇帝立即下令加以制止。唐武宗还拆毁寺院，废毁释家经典。宋朝建国以后，始终与北方的辽、金对峙。双方为了彼此的利益，都互相封锁消息，保守机密。因而双方对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也都管理甚严。这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举例加以说明。元朝是少数民族的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原，并且推行残酷的民族主义政策和阶级等级压迫政策，激起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因此对鼓励人民起义，组织人民联合，宣传元朝统治不能长治久安的所谓妖书，都在禁止生产和流通范围之内。明朝书禁较松，并且自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就由皇帝亲自下令免除征收书籍税，因而

明朝的官刻私雕多如丘山。但关于经书、历书、律令的雕印，也有许多规定。清朝又是少数民族入主，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打出稽古右文的旗号，广搜天下遗书，寓禁于征，对书籍实行大规模的篡改和禁毁。所有这些，都反映历代统治者对图书的管理政策。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历经天灾人祸，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已足资珍重了。

书籍是人们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总结；是用文字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纪录人们经验、表述人们思想、传播某种知识的工具。因此，书籍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但由于书籍是有思想内容的特殊的物质产品，它就必然要因阶级的不同和时代的局限而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时代色彩。当我们在研究书籍于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时，还应当充分地看到这种局限性。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668页）。毛泽东同志关于古代文化的这种辩证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并且应该努力运用这些原则，将书籍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形成的历史背景，分辨清楚，摸出规律。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讲述中国古代书籍的历史，不一定需要严格依照中国历史上朝代的自然分期，而把书籍的历史死板地纳入它的轨道。这是因为书籍虽然与社会历史有关，但毕竟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二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包涵的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也不能包罗万象。例如自唐朝以后的历代刻书，从广义上讲尽管也可以算是书史的内容，但这样一来，一部中国古代书籍的历史，就会膨胀得不晓得多大。如果是蜻蜓点水，面面俱到，又会浅尝辄止，说不清楚。鉴于这两点，这次想就书籍的形成条件、制作材料、制作方法、装帧技艺、管理方式等分别讲述。以事带时，借时叙事。这里打个比方：我们知道中国史书有所谓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几种体裁各有各的长短。我们现在讲古代书籍史，也想改变一下过去一味编年体书史的体例，而代之以纪事本末体。如果可行，那么我们这部书籍史，便可名为纪事本末体的《中国古代书籍史》。

二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一)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文字是构成书籍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文字就没有书籍。但文字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它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成熟定型，是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的。

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彼此之间也常常需要某些交际，需要交换某种意图，表达某种思想，交流某些经验。但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们彼此之间要完成上述的交流，开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凭借，只有靠声音和行为的结合，来达到目的。后来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声音逐渐定型，为许多人所熟知，所掌握，于是出现了语言。

语言的形成并不断丰富，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着极大的作用。但语言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讲过去就没了痕迹，二是受到障碍或离得太远就又听不到，或者听不清楚。因此，人们要想了解远方和过去的事情，光靠单纯的

语言就无法达到目的了。怎么办呢？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还是想出了办法。即把记忆与语言相结合，口耳相传。为了接受和传播彼时彼地的某种经验或某种知识，就把这些经验和知识先用简括洗练的语言固定起来，编成歌谣、谚语、口诀、故事等等，彼此相告，代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传说”。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的某些历史知识，就是靠那时聪明智慧的人民用“传说”的办法流传下来的。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有巢氏绝穴筑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后羿射日、共工触不周之山等等，就都是古代传说。虽然这些传说都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各个相应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

我国远古时期这种口耳相传的“传说”办法，对后世影响很深。就是在有了文字之后，由于书写传播的困难，许多知识也还是靠口传心受。历史上的所谓今文经，就是靠师承关系，口传心受之后，靠整理记忆形成的。我国过去许多行业，许多技术，也是靠师承关系，口传心受继承下来的。说理论，说不清；论技术，手艺高明。怎么回事？很多就是师傅传授的。足见，传说确是一种人们交换思想、交流经验、传授知识的好方法。

但传说的基础是靠人们的记忆。按巴甫洛夫的学说，人的有些记忆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就可以被遗忘。因此，靠记忆流传的东西就会有很大的出入。不但内容事实会有出入，不同人的叙述，乃至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的叙述，从语言的运用，到所渲染的情节，也会有出入。所以一件传

说，经过若干人的口耳相传，往往就会离开原样，难以置信。怎么办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又发现了这是由于记忆的差错所造成的，于是就又在记忆上想办法。世界上各个民族几乎都曾有过这样的阶段。他们曾经用各种实物、各种不同的颜色来代替语言符号，以佐记忆。在我们中华民族，则流行过结绳记事的办法。当时的人们为了记取某种经验，传播某种知识，记录某个事件，就在绳索上打起许多大小不同的结，一结表示一事。这就比单凭记忆要好多了。《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胠篋篇》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都指的是这种结绳记事的史实。

事实上，许多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上，都曾有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时期。像云南的傈僳族、哈尼族、鞑靼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就都曾流行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办法（图一）。外国如波斯、秘鲁，也流行过此法。尤其是秘鲁人，据说对结绳非常考究。他们在一条主要绳索上，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细绳，用来记录不同的事物。如红绳代表军队，黄绳代表黄金，白绳代表白银，绿绳代表粮食。绳子上再打结，以代表不同的数目。他们打一个单结代表十，两个单结代表二十；一个双结代表一百，两个双结就代表二百。古代的秘鲁，每个镇上还设置官吏，专门管理结绳之法和负责对结绳意义的解释。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体完整的结绳办法了。据说现代还